



1993年8月于正定龙兴寺



1997年6月于山东大学



1997年5月于福建武夷山



2000年3月于母校未名湖畔留影

目 录

自序	(6)
第一章 来京以前	(9)
(一) 家庭和童年	(9)
(二) 初进中学	(14)
(三) 重返私塾	(17)
(四) 学医无成	(21)
(五) 在无锡国专	(23)
(六) 报考北大的前一年	(32)
第二章 在北大上学	(37)
(一) 初到北京	(37)
(二) 在北大学习	(40)
(三) 初任课代表	(47)
(四) 下乡“土改”	(50)
(五) 补课和等候分配	(62)
第三章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	(65)
(一) 第一天报到	(65)
(二) 在大同煤矿	(69)
(三) 再次分配工作	(71)
第四章 不平静的书斋生活	(74)
(一) 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	(74)
(二) 《红楼梦》研究批判	(76)
(三) 不断的运动	(79)
(四) 运动的间歇	(81)

(五) 从1957年到1958年·····	(84)
(六) 进城以后·····	(86)
(七)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88)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 ·····	(90)
(一)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90)
(二) “五七干校”的生活·····	(92)
(三) 运动的继续·····	(96)
(四) 在文化部“录音组”·····	(99)
(五) 回到文学所·····	(105)
第六章 走上正轨 ·····	(108)
(一) 领导班子的建立和几项工作·····	(108)
(二) 南京之行·····	(111)
(三) 访问日本·····	(112)
(四) 右目失明和眼科手术·····	(114)
(五) 繁忙的1984年·····	(115)
第七章 曲折的道路 ·····	(121)
(一) 突如其来的改选·····	(121)
(二) 走自己的路·····	(124)
(三) 继续探索·····	(126)
(四) 我的退休·····	(129)
(五) 初次培养博士生·····	(130)
第八章 九十年代 ·····	(133)
(一) 《文选学》研究会·····	(133)
(二) 招收第二届博士生·····	(138)
(三) 几项业务工作·····	(143)
第九章 我的退休生活 ·····	(148)

（一）退休之初.....	（148）
（二）移居西直门.....	（150）
（三）手术室外.....	（152）
（四）赴台讲学的设想.....	（155）
（五）退休后的乐趣.....	（157）
后记.....	（160）

自序

当我开始执笔来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思想里存在着许多顾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自问平生碌碌，一事无成，把这些琐事笔之于书来告诉大家，未免“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讥，而且还会浪费读者的时间。其次，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虽然写过一些文章，但都属考证或论说之文，至于那些生动活泼的文章，不但从未试过，而且自觉也无此才能。因此动起笔来，确有点像陆机说的那样：“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之感。所以有时甚至想就此搁笔了。但我终于坚持写了下去，总算把它写完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虽乏善可陈，却也见到过许多大学者，亲自受到他们的关怀和指导。自问这几十年来，正是在这些师长的循循善诱之下，才避免了不少弯路，多少取得了一些进步。至于我自己至今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那一方面是由于我个人的努力不够和天分有限，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着历史的原因。回顾当年师长们对我的教诲，不光使我终生受用不尽，而且对现在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同样也会是大有帮助的。现在这些前辈师长多数已经谢世，后来的研究者已经不可能再受到他们的亲炙，因此我更有责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比我年轻的人。因为这些师长的教诲，本是治学的宝贵经验，也是学术界共同的遗产。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传达给下一代，这应该是我无可推辞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不顾自己的谄陋，记述了这些嘉言懿行。我想这些师长对我的教诲，对别人也是很有益的。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在这本小书中，自然也免不了要谈到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这里有些可能是一得之见，虽未必有多大意义，也可供比我年轻的同志参考，更多的应该说是教训，这些教训，也许可以供别人作为前车之鉴。当然，对这些经验和教训，也只是根据我个人的想法来评价的，是否值得参考和借鉴，还希望广大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前几年流行于学术界的所谓“新方法”问题。尽管有些提倡“新方法”的人认为我是这种“新方法”的反对者，但我至今不承认这种看法。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每次重大的进步，都必然有着“方法”的更新。宋人之于汉唐是这样，清人之于宋明是这样，“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是这样。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反对别人去研究和介绍当代西方的某些新观点、新方法。问题在于当有些人在接受某种新观点、新方法时，不是认真地加以翻译、介绍和阐释这些学说，让别人理解它，接受它，而是板着面孔责备别人“保守”，不知道接受这种新说。其实他们不想一想，像我们这一代人的外文水平，是否能读懂这些书的原文就很成问题（其实有些热心提倡“新方法”的人，其外文水平也未必比别人强）。何况即使能读懂，也未必找得到这些原著。再说纵使我们见到了这些“新方法”的著作，也要有个较长的熟悉和理解的过程，才谈得上接受和运用。看来这些人对推广“新方法”实在过于热衷了，竟要一些不知道、不理解这些“新方法”的人一下子变成这些“新方法”的信徒。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会棍棒交下，甚至追究别人的“心态”，用勒令“停业整顿”相威胁。这样，被批评者自然很难心服。再说有些“新方法”的宣传者为了证实自己的新说，有时引证史料又不甚严谨，甚至对史料的理解也有错误。因此迄今为止，我还不承认自己是“新方法”的反对者，我所反对的仅仅是某些借着“新方法”的口号来整人的人。

本来，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学术本身也不可能有所发展。当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只能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妨各行其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如果因为别人一时接受不了某一新说就视之犹同“张作霖、吴佩孚”这些军阀，请问这和中世纪欧洲的“异端裁判所”又相去几何呢？学术上有些问题本来是很复杂的，即使多数人有了共识，少数人也仍可坚持其不同意见，何况有些新说，还远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呢？这个问题在我思想中存在很久，至今未得解决，所以在书中也

许谈得多了些。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一点即是此书的文笔颇乏生动，这是我久已认识而始终不能克服的毛病，在这里只能向读者致歉了！最后，我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写成和出版，首先应该感谢韩雪博士的鼓励和推荐，更应该感谢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不弃。如果不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我是没有信心和勇气去写这样一本自述性的小书的。

曹道衡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时年七十有二

第一章 来京以前

（一）家庭和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据说我家从事医术已有七八代历史，可是到我手里，却失传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可以称为曹家的“不肖子孙”。

曹家虽说是苏州人，但祖上原出安徽歙县，移居苏州已经很久，以致我现在已说不清这个家族迁居苏州的时间了。听老人们说，曹家的祖先刚到苏州是从事商业的，后来亏了本，就改习医术。那时的境况也并不算好，直到我的曾祖父手里，才成了当时的名医，发起家来。我曾祖名叫曹元恒，医号沧洲。因为他的医术在清末的江浙一带很有名声，所以有一次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有病，就叫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到苏州召他入京为皇帝治病。关于我曾祖父为光绪治病的事，近年来常有人提到，但我对此事却所知甚少。我只是早年曾听到老人们提起，说给皇帝治病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我曾祖父开的处方都是些平安药，并没有使出他的真本领来。但通过切脉，他已经多少预见光绪帝的病难于治愈，在一度减轻之后，就很快南归。后来光绪的病再次发作，又曾征召过他，但他装病推辞，没有进京。那次为皇帝治病，大约对我家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清末，我家也算苏州的名门。

我的祖父叫曹岳昭，字融甫，他是我曾祖的幼子，他在苏州行医，有了一定声望以后，就移居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有着所谓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那时正值北洋军阀混战之际，江浙一带发生了齐燮元和卢永祥之战，很不太平，因此要在租界中找一个安身之地。我祖父到上海后，先是在租界里租一处房屋，开业行医，后来赚了些钱，就在威海卫路一个里弄中买了一所房子，既作住宅，又作诊所。后来我祖父也就是在这所

房子中去世的。那已经是抗战中期的事了。

我父亲叫曹凤来，字泰吉，也是中医，一直在上海行医。我的母亲姓潘，是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潘世恩的玄孙女。潘家是世族，文化教养很高，我对古典文学发生兴趣，主要是受了舅家的影响。近年来，有一些朋友常常说我继承了“家学”。他们大概是我受了曾叔祖曹元弼先生和从曾伯祖曹元忠先生的影响。其实，曹元忠先生一直住在北方，而我家一直在南方，我从没有见过他，只是幼时在家里见过他的文集叫《笺经室集》，那时年纪还小，看不大懂。曹元弼先生我倒见过几次，他住在苏州，直到解放后才去世。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礼经校释》，是一部研究《仪礼》的专著，在清末民初很有影响。他是清代的“遗老”，到晚年时已双目失明，所以从不出门。我年轻时到苏州，曾去拜见他，他已经八十高龄，自然也不会向我这样的小孩子讲什么学问。



四岁时摄于上海

我是1928年出生在上海的。据说出生的地方叫“茂德里”，在现在人民公园附近的新昌路。对此我已全无印象。因为大约在我两岁左右就搬到了威海卫路。这大约是1930年的事。搬到威海卫路时，我还什么也不懂，但到1932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我还多少有些印象。首先是那次我家忽然来了许多苏州亲戚，都是逃难来的，威海卫路的房子本来不小，这时却住满了人；还有是从家里向北望去，可以看见闸北一带到处冒起黑烟。这就是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的结果。总的来说，那些印象都很零碎和模糊，因为那时我还很幼小。

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次避难来上海时病逝的。去世后家里办丧事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见到大人们都穿起白布的衣服，还常有些和尚来敲敲打打，有时大人也领我去磕几个头，这些事，我自然丝毫不理解其意义。

我曾祖父去世后不久，由于淞沪抗战已经停止，苏州来的本家和亲戚都陆续回去，我家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平静的状态。童年的生活是这样的平淡，那些年好像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直到1935年我虚岁七岁时，才开始上学。我记得第一位老师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她和我一位伯祖母大约有些亲戚关系，并且也住在威海卫路那条里弄中。因为闲居无事，才来教我念书。我记得入学那天，家里还点起了香烛，由大人领着我跪拜，说是“拜孔圣人”。拜完圣人，又向老师磕头，说是“拜师”。这一套仪式完毕后，老师就领我进入书房。刚入学的时候，无非是先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一般先跟着老师念，然后在石板上照着写。第二天再念给老师听，写给老师看，念对了，写对了，再上新课。这一些对我来说并不太难，因此我对上学也并无反感。然而上了一段时间学，又加上了习字课，倒确使我觉得不太容易。因为习字要用毛笔，开始时是写“描红”。我记得小时候真描过鲁迅提到过的“上大人，孔乙己”等字。那是大人们托亲戚从苏州买来的。这种描红纸是用土纸印的，最为难写，如果把墨磨得太淡，下笔就渗成墨团；磨得太浓，笔下的墨色又不能匀称。不过最叫我头痛的则是毛笔这东西不

大好使唤，一笔下去，不是比纸上的红字粗，就是比它细。开始时老师还握住我的手教，这在我家乡称作“把笔”。不过，这种“把笔”，最多也不过三五次，就要我自己去写了。所以我对习字课多少有些害怕。但渐渐地也有了一些进步。

这位老师教了我大约不到一年，后来她和丈夫闹翻了，回了娘家，就不再来教我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对她的情况也一无所知。这位老师走后不久，家里又请来了一位老师，也是女的，她曾经做过小学教员，姓黄。黄老师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因此教了我一段时间，就陆续地增加了一些课目，如算术、英语等等。那时我读的基本上都是新式教科书，大约我的家长们只想让我在私塾中读完小学的课程，就去报考初中。

不过，我的家长们虽然叫我读新式教科书，却又念念不忘要我接受旧式的教育，那就是读儒家的“四书”、“五经”。大约因为我在上学之始，就已经认识了一些字，所以家里并没有叫我从旧式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等入手，而是首先读《论语》。我记得那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沦陷后不久。开始时也是请黄老师教读。刚读《论语》时，我完全不懂，尽管黄老师也给我讲解，但这些道理对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也显然难于理解和接受。不过，当时家里对这种学习特别重视。家长们谆谆地告诉我说，学习文言文特别重要，将来走上社会，不论公私的信件都得用文言文，尤其我家是做中医的，写“脉案”（说明患者病情及治疗方法的文字，一般写在处方前面。解放前的中医开方子，总有一段这种文字）总不能用白话来写。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对读“四书”颇为认真，而且也不敢不认真。因为当时的办法是一部《论语》读到下半部，还得经常背诵上半部的文字。这种死背死记的功夫，在当时的确没有多大收获，但无可否认的是对我后来学习古典文学还是有不少好处。

我开始读《论语》时，正是抗战刚爆发之际，那时苏州的亲戚有的早在“八·一三”之前，就来到上海租界里，但多数人因为留恋乡土，并未及早成行，等到战争一打响，就没法再去

上海，只能到附近农村去躲避战火。我的舅家就是这样。几位舅父在“七七”以后，就把外祖母和一位尚未结婚的姨母送到我家。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来，因为当时的形势很清楚，一旦打起来，就不会在短期内停止，所以要作许多安排。（例如：解放后潘家捐献给国家的《大盂鼎》，在整个沦陷期间，就一直深埋在地下。这种埋藏由于怕走漏风声，只能全由自己家的人动手。）这样，他们在抗战初，就都只能逃向农村。但苏州的乡村治安很不好，日寇也时常下乡骚扰，因此几位舅父就陆续从乡下逃向上海租界。舅父们来到上海，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三舅父潘景郑先生是文史专家，他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他来到上海后，一时没有工作。我祖父本来就 very 看重古文，认为这是让我学习古代典籍的极好机会，于是就亲自求三舅教我读书。这时，我读《论语》尚不到半部，大约是《八佾》的“仪封人请见”一段起，就是由三舅父教读的。那时候，我的学习课程是上午从三舅父读《论语》，下午从黄老师读英语和算术。从这时候起，我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接着便是读《春秋左传》，中间还选读了《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这种读书的程序，是我的家长们决定的。现在看来，当时家长们的意图大约是要我继承祖业，仍做中医。因为后来我阅读过一些著名学者回忆早年读书的情况，他们一般是不会去读《古文观止》一类被视为“俗书”的。不过作为中医，写脉案之类的文言文，也足够应付了。我在家念书，一直念到1940年的夏季，家长们才叫我去报考中学。

（二）初进中学

我在1940年的夏秋之交，报考了中学。那个学校叫“南方中学”，校长姓徐，是苏州人，还有一位英文老师姓张，也是苏州人，他们和我父亲都是朋友；同时，我还有一位表兄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他上初三，我上初一，家长们认为这样可以有个照顾。这所中学设在上海的凤阳路（当时叫白克路）。在南方中学学习期间，正是“孤岛”时期，当时租界还存在，但其他地方都已被日寇占领。在租界里面，多少维持着一些“民主”和中立的外衣。当时租界内发行的报刊各不相同，有进步的，有国民党的，但也有日伪的。因此在租界里的学校，一般不用念日语，也不至于进行日寇的奴化教育，但也不能进行激烈的爱国抗日宣传。一般来说，上海一带许多人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租界里上学，因为他们认为在沦陷区的学校中上学，要念日语和使用敌伪编的教科书，大家都认为是耻辱，很不愿意。我家所以能送我去上中学，也有这个原因。

我在南方中学一共念了三个学期。应该坦率地说，我在南方中学的学习成绩很不好。那时候年纪小，贪玩，不知道用功。当时我的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成绩只是平平，而数学最差，还常常不及格，家长批评我，我也不大在意。这三个学期的学习，似乎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其中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碰上了一次炸弹爆炸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时上海的租界上，各种政治力量都同时并存。在那里，既有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也有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大约是1941年的春季还是秋季，先是国民党的特务用定时炸弹炸了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后来汪伪特务就用定时炸弹炸“中央银行”来报复。“中央银行”设在现今凤阳路南靠西口处，大约相当于新华电影院的后面，宝隆医院之西。其对面就是南方中学。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正在上课。炸弹爆炸的时候，我好像并没有听到声音，只是感到一种强烈的震动，身不由主地从椅子上滑到地上，连

椅子也倒了。当我清醒过来一看，全班同学都震倒在地上，也不知道是什么事。那时我们几乎都有点儿头发懵，倒也不怎么害怕。接着学校里就宣布放学。因为中学的校门正好对着被炸现场，所以那天破例打开了后门，让我们从一条小弄中出去。走到马路上，只见人很多，可能是附近居民受惊后出来看个究竟，也有些是南方中学学生的家长，闻讯后赶来接自己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些警察，他们把通向现场的路段封锁了。我也顾不上这些，只是一个劲儿往家走，大约从凤阳路向西走到石门路（那时叫卡德路）有轨电车拐弯的地方，就见到我的八舅父潘永瞻先生（他当时在我家跟我祖父学中医），我才知道家里已经分头到学校附近来找我。后来，也见到了我父亲，他在另一个方向寻找，因为人多所以分头来寻我。这样，就一起回了家。那次炸弹爆炸对南方中学好像没有造成太大损伤，只有前楼有几块玻璃被震破，一位高中同学耳朵旁边被碎片擦伤。所以第二天就照常上课。这次事件对我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但产生了一定影响，我的祖父因此感到上学校念书也不安全，萌生了叫我回家念私塾的想法。

我在南方中学上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三四个年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时，我刚念完初中一年，准备升初二。那时太平洋上的局势也日益紧张，即使一般老百姓也能预知日美之间即将开战，而且一旦开战，租界这个孤岛也必然沦入日寇之手。租界中的居民有不少是从日寇占领区逃进孤岛的，他们都熟知日寇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因此人心惶惶，但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听天由命。但这一切终于发生了。那是1941年12月7日的夜里。12月7日是星期天，学校放假，我正好钢笔坏了，上午还坐公共汽车去南京路买了枝钢笔回家，路上一切照常，没有任何迹象。晚上睡觉时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只是到了夜半，大人们听到炮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详情。我那时睡得很死，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是星期一，就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上课。当我出了里弄走上马路时，才发现情况有些异样，路上的行人很少，有些本来营

业很早的店铺仍关着门。一直走到了现在南京西路石门路的地方，才见到有拿着枪，一脸杀气的日本兵。这时，我本想往回走，再一想，这样就引起他怀疑，反而不好，就壮着胆走向学校。到了学校里，一看同学大多数也都来了。老师也照常来上课。大约上了两节课，一位管行政的老师跑进课堂来叫我，说家里来人，说是我父亲病重，叫我赶快回家。我心里很纳闷，出门时父亲还好好的，怎么说是病了呢？那位老师心里很明白，对我说：“你别着急，大约是日本和英美打起来，日本人进了租界，家长怕出事，才叫你回去。”我走到办公室，见来的是我祖父从前的司机的亲戚，因为住得近，所以家里托他来找我。我跟他走出校门，他告诉我说父亲没事。我也就回到家里。到家后，我看到大人们都在那里商量办法。他们认为：上海是大城市，日寇进租界并未遇到抵抗，大约不至于像南京等地那样野蛮杀掠。但孤岛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各种抗日党派都曾在这里活动，因此有可能要挨户搜索，也可能趁机打劫。于是就把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都集中在顶楼一个小房间里，然后用一个立柜挡着那间房间的门。这种掩耳盗铃的办法，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日寇进租界的当天，我虽然回了家，但第二天看看路上没有什么事，左邻右舍的孩子也照常上学，所以我也和平常一样去上学。只是晚上很早就关上大门，谁也不敢出去。事实上那时上海的治安确实不好，而且上街也常常会遇到麻烦。我家有个远亲，大约是我父亲的表兄的女儿，在街上走路，因为天冷，把双手插入大衣口袋里，竟被日本兵打了耳光。据说那些日本兵最怕人把手插在口袋里，因为他们担心口袋里有手枪。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一般很少出门。但学校并没有停课，我还是每天上学。这样一直到学期終了，我念完了初二的上半年。这已经是1942年初了。

（三）重返私塾

在1942年上半年的学期开始时，南方中学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日寇进入孤岛后，就强制各级学校一律要改用汪伪政权规定的课本，还要添加日文。原来的校长觉得是耻辱，愤而辞职，由一位原来教体育的老师继任。我祖父觉得念日文和汪伪的课本是奇耻大辱，就不再叫我上学校了，于是又让我从学校退回私塾。这次从学校退回私塾，情况和过去不大一样了。这时，我的姨丈顾起潜先生从北京燕京大学迁回南方，主持合众图书馆的工作，三舅父也参加了合众图书馆的工作，没有时间来教我读书了；黄老师也有病离开了我们家。于是家长就请了两位老师教我。一位是高组文先生，教我读《古文观止》，他原是南方中学的老师，日寇进入孤岛后不愿意用汪伪的教材教书，就出来教私塾。还有一位是祖母的远房表侄，姓孙，我叫他叔叔，他教我英文和数学。这样大约念了半年左右，我祖父病重了，我的学习也时断时续。我祖父的病，在现在看来大约是食道癌，症状是吃了东西胃和胸部就胀痛，呕吐，还吐过不少鲜血。我家本是中医，我父亲和几位堂伯、堂叔一起开方，并不见效。于是又请来几位西医，也都束手无策。那时家里真是病急乱投医，不知为什么请来一个巫婆，她说要让我祖父活吞一条泥鳅，病就会好。我祖母竟信以为真，买了好多活泥鳅，养在一个盆里，准备给祖父吞下去。那时家里不少人都不赞成，而祖母又执意要这样做。我那时也很着急，可作为小孩子，根本没有发言权。正好那天孙老师来了，给我上英文课，他看我听课时心不在焉，就批评我。我当时就哭着告诉他说祖母听信了巫婆的话要让祖父吞活泥鳅。孙老师一听也急了，马上说：“走，我们找你家大人去！活泥鳅要是误入气管，会马上致命的。”正好这时我的堂伯父曹鸣高先生也来了。于是我的父母和堂伯、孙老师一起向祖母去说明活泥鳅吞不得的道理。因为大家说得有理，祖母终于答应不让祖父吞活泥鳅了，但她还是气鼓鼓地